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晚年毛泽东 的艰苦探索

WANNIAN
MAOZE DONG DE
JIANKUTANSUO

王立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对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
践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
外国，都具有永久的魅力！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

王立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WÁN NIÁN MAO ZE DONG DE

JIAN KU TAN SUO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

王立胜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375印张 4插页 408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4-02768-5/A·9

定价: 13.00元

总 序

黄楠森

1993年12月26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套《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这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篇序文就是我应约这套丛书撰写的。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近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提倡和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和干部的艰苦卓越的实践和认真刻苦的探索才确立起来的。那么，又怎样估计建国后30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呢？这条道路同这30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对此人们的看法颇不一致。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早期的失误和挫折，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取得了成功，而社会主义建设，却由于完全采用苏联的模式，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和曲折。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本上是失败的。我认为这就夸大了过去的挫折，忽视了30年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合理部

分。在我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前只是基本上确立起来了，它的具体内容、具体环节、内在机制还要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这些任务的完成不仅有赖于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大胆探索，也有赖于对过去的经验教训的认真吸取，如果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完全对立起来，是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针对当时社会上某些错误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号召，并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①这是一般地讲的，其中无疑包括毛泽东及其战友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综观建国后3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我认为毛泽东及其战友（其中包括邓小平同志）建国就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今天探讨一下毛泽东在探索这条道路时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无疑是对他的诞辰的最好的纪念。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它的基本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并指出这个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总之，这个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认为不管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谓中国特色总是最能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物质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的，总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中国特色决不是为特色而特色，只有那些适应中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8—189页。

国国情的特色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如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这样理解，那么，正是毛泽东及其战友开始探索这些特色的。下面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作一说明。

第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大家知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正是毛泽东用以指导整个中国革命（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指出：坚持“两个凡是”，“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靠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靠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成就也是靠这个，而其中的失误和挫折则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放弃了这个原则，而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原则在有的时候或有的地方没有真正贯彻到实际活动中去，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个凡是”的原则则是完全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立的。正是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实事求是原则的权威，并把它真正贯彻到整个国家的实际生活中去。在它的指导下，整个国家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了一切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1页。

干部；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是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空前辉煌灿烂的成就。今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也要依靠这个原则的指导。这个原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在贯彻这个原则的过程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能忽视这个原则以及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关于这个原则的宝贵财富。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性质上讲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由于它是由马列主义指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它胜利的结果不能不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已经把官僚买办资本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之所以能胜利也是由于它具有中国特色。它不但不同于近代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才找到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否则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的过程和胜利注定了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要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既然民主革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也必然会具有中国特色。只要不割断历史，只要承认中国民主革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例如武装斗争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形式等等），就不能设想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会不顾中国国情而完全照搬苏联。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比起苏联来就具有适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特色。如对民族资产阶级没有简单地加以剥夺，而是采用赎买政策逐渐加以改造；对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也采用各种合作形式逐步加以改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失误，但基本上是成功的。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基本上采取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形式，这种方式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实践中却也暴露出不少严重的弊端，时代向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实际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当时就开始了探索。

第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中心任务是以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来规定的。如果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心任务就是革命斗争；如果主要矛盾是生产落后，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转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及时地讨论并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是说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了。毛泽东对八大决议的提法本来是同意的，在八大以后的多次讲话都表明了这一点。甚至在1957年夏反右斗争正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在当时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仍然明确

讲，“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①。但是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是动摇的。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大起大落的曲折前进的时期，经济建设虽然摆到了重要地位，但常常受到人为的路线斗争的干扰，有时阶级斗争被摆到中心任务的位置。这种起伏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形成。“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其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就是说，1956年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经过十分曲折的道路，直到1978年才真正解决，整整耽误了22年。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然而不能否认工作重点要转移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及其战友提出来的。

第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是体制改革的理论前提。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不承认其间有什么矛盾（到了晚年才勉强承认），当然不需要改革，而毛泽东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并作了深刻的分析，这实际上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其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同，是基本适应中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解决。矛盾包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含着不适应，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其间不适应之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之处有：公私合营企业的存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某些环节、各经济部门间的生产和交换的某些相互关系、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之处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分析是不够深入细致的，也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倾向，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才建立不久，许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于毛泽东。不管怎样，毛泽东总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要解决许多矛盾，制度本身的各个环节都要不断调整，这就是体制改革，尽管毛泽东当时没有采用改革的概念。毛泽东还指出，现时适应的环节随着情况的变化又可能变得不完全适应，甚至完全不适应，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是绝对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第五，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中各种问题的深刻分析。如果说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较为简略的话，他在1956年对于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分析则是很深入的，这充分体现在他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之中。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关系，管理好了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是根据两种实践经验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一是苏联近四十年经济建设中的经验，由于我国经济建设时间还很短，毛泽东特别重视以苏联经验为鉴。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

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在具体分析每一个关系时，毛泽东几乎都要谈到苏联的经验教训。例如他在谈到第一个关系时就对比起来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②这些都说明他在极力避免盲目照抄苏联。

当然，文章更多地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探索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并努力寻求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形式。他所提出的十个问题没有一个不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我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水平的限制，毛泽东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今天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但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基本正确的解答，就足以表明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和作出的解答在今天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借以推动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事业。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仅就第四个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作一简略分析。

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承认“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对于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主要谈了谈过去的缺点和当时的作法。最后他指出：“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②同上，第268页。

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①这个结论辩证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今天也是适用的。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毛泽东把问题看得比较抽象简单，认为只要在政策上作些妥善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可以满意地解决了。他没有看到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要解决好，还要涉及经济政治体制，甚至要涉及所有制。他的思考一直还局限在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范围之内。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仅仅政策上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条件下还需要把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使公有制多样化，而且需要允许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需要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而且需要允许其他分配原则存在。这些经济形式适应我国生产力的水平，适应我国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也适应世界经济的现代水平，再加上具体环节的适当调整 and 具体政策的正确实施，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在当时考虑得虽然简单一点，原则上却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是根本抛弃毛泽东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原则，而是使对他的原则具体化、深化、充实和发展。其他九大关系的情况，莫不如此。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谈到如何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的道路，指出：“为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想，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却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①。这篇文章的篇名也表明社会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应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毛泽东没有贯彻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有时往阶级斗争为纲摇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对建国后30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正确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实践证明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今年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坚持10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基本解决了。当然，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这套《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也涉及了其中的许多专题，认真地研究这些专题，郑重地反映和宣传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402页。

序 言

樊瑞平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新著，是青年学者王立胜近几年来悉心研究晚年毛泽东所取得的一项可喜成果。80年代中期以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需要，伴随着人们对原有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刻反思，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课题。本书作者在时代的感召下，从1988年开始，决然将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一既有历史沉重感又有强烈时代感，且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课题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先以论文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然后又将某些阶段性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整理成硕士论文提交答辩，并广泛征求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而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终于以将近40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读者和社会。近年来，对晚年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这些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散见于报刊杂志或者在某些著作的章节中得以体现，以专著的形式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本书堪称为弥补这个遗憾之作。书稿写出后，我通读了一遍，作者要我作序，在此我打算

就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以及本书的写作谈些自己的看法，权作为序吧。

(一)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在早年他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愿。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这种志愿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下，日益变为他的切身实践。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找到了通向胜利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谁都承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功”。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又领导中国人民顺利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到晚年，他仍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苦的探索，为中国人民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而呕心沥血、不停地战斗、搏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深切崇敬和深情的怀念。

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晚年为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和观点，比如，社会主义

社会的矛盾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哲学理论观点，都对马列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如本书“中篇”所详细阐述的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对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道路的探讨，虽然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都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建构，对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晚年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某些令人痛心的失误，而且正是这些失误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许多弯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给国家建设造成了损失。

总之，晚年毛泽东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误；有反映时代趋势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邃的思想和创见，也有违背马列主义原则、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理论观点。因此，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

(二)

正是这个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过去曾引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运行，并深深渗透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而且现在仍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在思考它、研究它，试图搞清楚晚年毛泽东在探索中的成功和失误，弄清楚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实践与晚年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复杂关系，以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近几年来，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这既表明了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日趋深化，也

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当代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从不认识、不承认到认识、承认和接受；从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到树立为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前进的旗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任意拔高和任意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两种倾向；近些年来又有过“非毛化”和“毛泽东热”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发生。这样的过程和这些复杂情况的出现，是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要求，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就是说，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可以过分夸大，也不可以任意缩小。对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更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只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联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化，以及时代变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才能客观、准确地分析、评价晚年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才能理解眼前出现的“毛泽东热”，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热切关注晚年毛泽东研究的真实动因。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毛泽东的事业，是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发展融为一体的。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真正了解现当代中国，就不能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